

2008年以来台湾社会运动的政治化倾向研究

张文生^{1 2}

(1.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2.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2008年以来台湾社会运动不断高涨,从“野草莓”到“反课纲”表现出越来越鲜明的政治化倾向,即打上了深刻的意识形态烙印,介入岛内政治斗争、影响台湾选举和牵制两岸关系,呈现出“台独化”、年青化、网络化的主要特征。未来社运与选举成为台湾社会运动发展的两个场域,“台独化”、政团化、选举化、网络化的政治化趋势更加明显。

关键词: 台湾; 社会运动; 政治化

中图分类号: D6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590(2015)06-0001-07

DOI:10.14157/j.cnki.twrq.2015.06.001

2008年,民进党下台,台湾社会运动逐渐高涨,从“野草莓运动”开始,通过反媒体垄断运动、“反核”运动、“洪仲丘案”到“太阳花学运”、“反课纲运动”等不断介入政治斗争。这使得近年来的台湾社会运动表现出越来越鲜明的政治化倾向,即打上了深刻的意识形态烙印、介入岛内政治斗争、影响台湾选举和牵制两岸关系等等。通过打击国民党执政的声望与效能,宣扬“反中反统”,阻碍两岸关系的发展,支持民进党上台执政,台湾社会运动已经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一、从“野草莓”到“反课纲”:台湾社运的发展

威尔逊在《社会运动导论》中指出“社会运动是有意识的、有组织的集体活动,旨在通过非制度化的方式引发或阻止社会秩序的大规模变迁”。^[1]台湾学者何明修认为“社会运动是一种特殊的集体行动,它:一、涉及到群体的共同参与,二、采取体制外的策略,三、以某一种价值作为引导。”^[2]这一定义揭示了社会运动的三大属性:群体性、体制外、共同价值诉求。学术界还把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兴起的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如“反核”和平运动、生态运动、新女权运动、种族民权运动、自由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消费运动、动物保护运动、平等对待艾滋病患者运动等等称为“新社会运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社会运动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内容增多,而且国际性趋势日益明显。

台湾的社会运动由来已久,也带有强烈的新社会运动的色彩。台湾学者萧新煌把台湾社会运动划分为不同特色的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1986年):社运的潜伏、萌芽和集结期。第二阶段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的民意问题研究”(11AZD034);福建省社科重点项目“拓展与台湾青年交流合作的方式与路径研究”(FJ2015TWA004)

作者简介: 张文生,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重大理论创新平台创新团队成员、执行长,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台湾研究院教授。

(1987—1989年):社运的勃兴期。在这两阶段,社运对台湾新民主的催生有明显贡献。第三阶段(1990—2000年):社运的大抗争、防堵威权主义反扑和制度化期。在这阶段,社运投入台湾新民主的打造。第四阶段(2000—2008年):社运与原盟友民进党政府转向暧昧,被吸纳,抗争力转弱,但多元化、生活化趋强。在这一阶段,社运似乎未能有力地巩固台湾新主体质。第五阶段(2009—迄今):‘第一代社运’再起、再出发,对抗旧威权政权复辟,‘第二代社运’持续多样发展;期待共同维护和深化台湾新民主。”^[3] 萧新煌对台湾社会运动的分类已经揭示出台湾社会运动与民进党之间的合作共生关系,它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共同打造、巩固、维护和深化所谓的“台湾新民主”。

确实,20世纪80年代是台湾社会运动的起点,也是台湾社会运动的黄金时期。随着政治上的“解严、开禁”,此时期台湾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抗争运动,包括农民运动、劳工运动、妇女运动、“原住民”运动、环保运动、老兵返乡运动、“反核”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各种集体的自力救济运动等。这些社会运动与党外及民进党主导的政治运动相结合,推动了台湾政治和民主的民主化与多元化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进党逐渐以体制内的选举参与取代体制外的街头抗争,使得社运团体与民进党渐行渐远;2000年民进党上台执政,社运团体担心被当政的民进党所吸纳,更是强调独立性;直到2008年民进党下台,开始重新重视并结合利用台湾社会运动团体,通过“野草莓运动”、反媒体垄断运动、“反核”运动、“洪仲丘案”、“太阳花学运”、“反课纲运动”等不断打击国民党执政的声望与效能。

2008年民进党下台以后,台湾社会运动再次呈现出不断高涨的趋势,并且社会运动与学生运动相互结合,相互渗透,各种政治势力尤其是泛绿阵营纷纷插手其中。2008年11月海协会与海基会领导人第二次会谈即“第二次陈江会”在台北举行,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李明璁发表“1106行动声明”,鼓动数百名学生到台湾行政机构前静坐并与警方发生冲突,这是所谓“野草莓运动”的开始。后来领导“太阳花学运”的林飞帆、魏扬、陈为廷等人均参与了这场运动。当时由于民进党刚下台不久,参与运动的学生对民进党并不信任,与民进党保持距离,林佳龙曾试图上台讲话但被赶下台。

此后,台湾社运团体通过介入乐生疗养院、三莺部落、国光石化、兰屿核废料、“同志婚姻权”、洋华光电、关厂工人卧轨、绍兴社区、美丽湾、文林苑、大埔案等事件,不断积聚能量,强化组织能力,培养组织骨干。

2008年以后,旺旺集团回台投资,先后并购中国时报集团中的“中国时报”、“中天电视台”、“中国电视”等媒体,形成旺旺中时集团。2012年7月25日,“中研院”副研究员黄国昌等人召开记者会,反对旺旺中时并购中嘉案。7月31日,包括台大、清大等30余个学生社团,在网络上组成“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正式宣誓加入反媒体垄断运动。2012年9月1日,近百个民间社团,在台湾新闻记者协会的主导下,发动9千多人走上街头举行反媒体垄断大游行。这些民间社团组成“901反媒体垄断联盟”,共同推动反媒体垄断运动。“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也参与其中,形成学运与社运结盟的形式,也得到了民进党的支持。

2013年3月9日,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两周年之际,“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等民间环保团体主办的“309全台串连废核大游行”在全台各地同步举办,要求台湾当局停止“核四”运转,并实现全台无核化。警方统计游行人数接近7万,主办单位则称全台有逾20万人参与。2013年8月3日,在一个台军士兵洪仲丘被凌虐致死一个月之际,台湾民间社运团体“公民1985行动联盟”发起了大规模的白衫军抗议运动,25万人齐聚台北街头,喊出了“要真相、要惩凶”的口号。

2014年3月18日,因反对通过《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一批学生和社运团体支持者冲进“立法院”,而后部分学生破门而入占领了“立法院”议场。持续24天的所谓“太阳花学运”拉开帷幕。期间还发生了“323攻占行政院”和“330凯道集结”等事件。学运诉求从“反服贸”到“反马反中”、“反宪政体制”,主张由“先立法、后审议”最终升级为“台湾独立”、“正名制宪”。

2015年随着台湾教育部门修改高中课纲争议的出现,台湾学生运动进一步向低龄化发展,在民进党、“台联党”、“北社”、“人本教育基金会”及“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等“台独”政党和社团的支持和策

动下,部分台湾高中生参与到“反课纲运动”中去。他们要求台湾教育部门撤销课纲微调方案,打出所谓“反洗脑、反课纲、反黑箱”的口号,鼓动比“太阳花学运”更年轻的一代高中生走上街头。台湾高中课纲俨然已经发展成为统“独”斗争的新战场。

综观 2008 年以来的台湾社会运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以公共政策为议题的传统型社会运动,例如“反核”运动、“同志婚姻权”运动等。2014 年 4 月间,借“太阳花学运”学生刚退场之势,“反核”团体再次掀起全台“反核”浪潮。林义雄宣布展开无限期禁食“反核”,最终迫使马英九当局宣布停止“核四”施工。

2.以个案为议题的维权型社会运动,这与早期的自力救济运动相类似。如乐生疗养院、三莺部落、国光石化、兰屿核废料、绍兴社区、美丽湾、文林苑、大埔案、洪仲丘案等事件都涉及当地居民及个人等的直接权益,在抗争的过程中引起社会的关注,吸引了社运团体的声援与支持。

3.以“反马”为明确目标的社会运动,多数都有政党推动的背景,借社运之名展开政治斗争。如 2009 年 5 月 17 日和 2012 年 5 月 19 日,由民进党发起并主导的“517 呛马保台大游行”和“519 呛马踹共大游行”(“踹共”为闽南语,意为“出来讲清楚”)在台湾北高两市举行。2013 年 9 月 29 日,台湾民间团体再次联合发起呛马大游行,迫使国民党“全代会”不得不延期。

4.以反对两岸交流为直接目标的社会运动。最早的是 2008 年 11 月的反对第二次“陈江会”的“野草莓运动”。2014 年 6 月 25 到 28 日,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台,也遭遇少部分社运团体的反对,期间还发生了“乌来铁链事件”、“高雄西子湾泼漆事件”等蓄意抗议冲突。

5.把“反马”与“反中”结合起来的运动,如以“反服贸”为号召的“太阳花学运”,以及“反课纲运动”,带有鲜明的“反马反中反统”的政治色彩。

二、“台独化”、年青化、网络化:台湾社会运动的主要特征

2009 年 5 月,台湾多个社会运动团体在台北耕莘文教院举办“2009 台湾社运团体全国年会——追寻公民社会的新动力”,发表了大会宣言,策划了十大社会运动的诉求、策略与具体行动。这十大社会运动包括:环境运动、妇女运动、劳工运动、族群运动、社福运动、教改运动、青年运动(学运)、司法人权运动、媒体改革运动、“国会”监督运动。^[4]台湾的社会运动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政治化的倾向越来越浓厚,意识形态日益鲜明,与民进党等泛绿政党与团体的结合更加紧密,对两岸关系的介入更加直接。所谓台湾社会运动的政治化,是指与传统的社会运动仅仅关注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带来的某些社会议题不同,近年来的台湾社运开始出现立场鲜明地打出意识形态的旗帜、介入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牵制两岸关系的发展等政治倾向。2008 年以来的台湾社会运动呈现出一些明显的新特点,运动主张的“台独化”倾向、运动主体的年青化、动员形式的网络化特征尤其明显。其中意识形态的“台独化”反映了明显的政治化倾向。

第一,是运动主张的“台独化”倾向。在所谓的自发性群众运动的背后难掩“反中反统”的“台独”意识形态阴影。无论是“野草莓运动”、反媒体垄断,还是“太阳花运动”、“反课纲运动”,都带有鲜明的“反中反统”意识形态,也培植了一批主导和宣扬“台独”的学生和学者。表面上看,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是由民间社团进行组织动员,但是这些社运团体“独派”色彩浓厚,往往在某项民生诉求中混入“反马反中反统”的声音,一方面通过“反马”汇聚台湾社会对当局的不满,另一方面借机进行“反中反统”的“台独”意识形态渗透。

台湾社会运动中的活跃分子或社运团体并不掩饰其“台独”的政治立场,在他们主导或参加的多次社运中,“反马反中反统”的政治诉求明暗可见。“太阳花学运”的普通参与者或许并没有强烈的“台独”政治倾向,但所谓的学运领导者林飞帆就公开宣称其主张“台湾独立”,宣称“我们的行动,在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之间,我们也做了新的定义,我们告诉政府,台湾未来属于全台湾 2300 万的台湾人”。

民,台湾的未来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5]其幕后指导者“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员黄国昌则更是表现出强烈的“反中”、“台独”意识形态。在台湾社运的现场也往往可见“台独”口号和标语,激进“台独”团体如“公投护台湾联盟”、“台湾社”、“908 台湾国运动”等和极端“台独分子”如史明、蔡丁贵、王献极等游走其间,在声援和支持社运的同时兜售其激进“台独”主张。

第二,是运动主体的年轻化倾向。虽然 2008 年以来的社会运动的参加者来自不同年龄层,从事不同职业,有教师、文化界人士,有普通上班族,有学生,而工商界人士极少。但是近年来的社会运动如“太阳花学运”、“反课纲运动”以 20 多岁、30 多岁年龄层的年青人居多,尤其高校学生受到具有强烈意识形态与理论论述能力的学校老师的切实影响,易于成为知识分子动员利用的对象,甚至还包括十来岁的高中生。根据台北大学社会学系在“太阳花学运”期间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学运参加者中,56%是学生,44%是社会人士;全体的平均年龄 28 岁,其中学生的平均年龄为 22 岁,社会人士则为 35 岁;参与者中,绝大多数为大学以上学历。

表 1 “太阳花学运”静坐参与者之教育程度分布^[6]

分类	“国中”以下	高中/高职	专科	大学	硕士	博士
学生 54%	0.7%	6.2%	2.2%	73.0%	17.2%	0.7%
社会人士 44%	4.8%	10.8%	8.3%	56.7%	17.3%	2.1%

第三,是社运团体的组织化倾向。台湾的社运团体纷繁复杂,派系林立,但是通过多次的运动,不同的社团、不同的人之间不断交流结合,相互串联,使得社运团体呈现出组织化的倾向。虽然这种组织化大部分是松散的,但是他们“反中反马”的目标相同,意识形态上的认同感较强,在运动过程中他们相互串联、相互支持、相互声援,使得社运的声势不断高涨。参加“太阳花学运”的社运团体就包括“黑色岛国青年阵线”、“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公民 1985 行动联盟”、“台湾守护民主平台”、“公投护台湾联盟”、“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台湾农村阵线联盟”、“台湾劳工阵线”、“台湾教授协会”、“台湾人权促进会”、“台湾团结联盟人民民主阵线”、“民主黑潮学生联盟”、多家基金会及数所高校社团等。

由于网络新媒体的应用,使得组织化和资源汇集的能力得到迅速提高,可以更加便捷地突破地域和专业的限制。“通过新媒体平台所创设的虚拟社群,能让关注某个共同社会议题的个体之间建立相互信任,建构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7]网络社群从线上走到线下,可以迅速地转化成为新型的社运组织,与既有的社运组织相互合作。网络新媒体的动员作用也使得社运组织的分工容易完成。2014 年 3 月 18 日部分台湾高校学生在“公投守护台湾联盟”成员的协助下攻占“立法院”会场,第二天即 3 月 19 日,“议场内外开始组织分工,决策中心就位,物资组、媒体组、医疗组、律师团、纠察队等逐渐成形。立院四周的集结点架设了舞台、服务台、医护站、物资站等”^[8]。

第四,是社会运动的软性化特征。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参与社会运动,近年来的台湾社会运动往往表现出温文尔雅的风格,打着非暴力、和平的旗帜,强调不与警方对抗,不与族群对抗,有意识地把政党和意识形态排斥在外,用垃圾分类、分工合作、歌曲宣传等手法美化和英雄化学运,以扩大社会运动的社会基础和动员能力。但是台湾社会运动的“反中反马”的本质却没有变,反而被装饰得更加具有欺骗性。

“太阳花学运”的过程中,“‘灭火器’乐团主唱杨大正为运动创作‘岛屿天光’一曲,现场教唱,录音录影,之后由台艺大学生制作成两支 MV,在网路上传播”^[9]通过影视、文宣、音乐建构所谓的“运动美学”,“为这个运动带来‘美感’”,目的是动员和吸引“很多人坐在这里,里面的学生会比较安全”^[10]让有些人虚幻地以为“这次的行动至今,整个‘立法院’内外,充满着所有青年的创意、艺术、品味、思辨、行动力,和最高的包容性。”^[11]乃至学运变成了流行的时尚,“反中”变成了“爱台”的表

现 形成了被扭曲的台湾社会文化。各色人等来来去去, 安营扎寨, 嘻笑怒骂, 似乎秩序井然, “这样游走于合法与非法之间, 在常轨之外建立常规的状态, 不正是台湾人喜爱的夜市情调?”^[12]

第五, 是社会运动的网络化特征。近年来, 网络媒体以其低成本、高收效的优异表现, 在各地社会运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事实上, 在这个资讯革命的时代中, 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也可不出门, 透过电子邮件、blog、推特、脸书等管道, 一样能达到讯息传递、资源汇集的作用。”^[13] 台湾青年常用的社交媒体如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批踢踢实业坊(ptt)、LINE 等, 搭建起一个个线上社群, 这样的互动平台串联起了关注相同社会议题的一群人, 网络动员也成为了现阶段最常见的社运动员方式。

“野草莓运动”中的“1106 行动声明”最初就发布在 ptt 电子布告栏上。由学生社团联合组成的“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也是通过“我是学生, 我反旺中”的脸书社团进行动员宣传。“公民 1985 行动联盟”最早也是由 39 名网友在脸书上串连组成, 成员有医生、老师、律师、平面设计师、咖啡店老板及服饰店员等, 平均年龄 30 岁。此外, 文林苑、华隆工会百日罢工、台大学生声援绍兴社区、“太阳花学运”、“反课纲运动”等事件均是通过网络方式进行动员。尤其是在“太阳花学运”过程中, 网络新媒体发挥了强大的动员与支持作用, “学运组织者和参与者广泛利用新媒体传播工具来发布和散播反对意见, 建构反服贸集体意识, 建立学运运动员网络, 获取国际支持, 筹措行动资源, 支持各项行动的组织和组织, 对于学运的发动和开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4]

三、社运与选举: 台湾社会运动政治化的发展趋势

社会运动组织往往被归属为“第三部门”, 即政府(第一部门) 和企业(第二部门) 之外的民间社会组织。第三部门和第一部门、第二部门之间既相互分工, 又相互制衡。然而, 近年来台湾社会运动的发展, 政治化的倾向越来越鲜明, 对第一部门的牵制作用越来越明显。个别社运组织和社运人物试图转型成政党和政治人物, 参与选举, 但显然从第三部门跨越到第一部门的空间不大。台湾社会运动政治化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 意识形态上“台独化”的色彩鲜明; 诉求目标上日益直接对抗两岸关系, 阻碍两岸关系的发展; 运动主体上往往是社会团体与政治团体、政党相互交错, 相互呼应; 斗争方式上把社会运动与选举政治相互结合, 暴力抗争与温和路线相结合; 在组织发展上有团体政党化、个人从政化的倾向, 但并不容易。

第一, 社会运动的“台独化”倾向不变。台湾社会运动的“台独化”倾向, 一方面表现在意识形态上的“台独化”, 通过教改运动、族群运动、青年运动、媒体改革运动等, 扩张和强化“台独认同”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表现在组织和运动形式上与民进党等“独”派政团的合作共生关系。台湾社会运动与民进党等可谓里应外合, 分进合击, 在两岸政策上牵制国民党主导的台湾当局。

台湾社运组织与民进党的合作共生关系由来已久, “在民主转型过程中, 第三部门中的倡导/抗争/社会运动组织与当年的反对党(民进党) 有着相当密切但又小心经营其合作共生的关系”。^[15] 2008 年以来, 民进党更加用心经营与社会运动组织之间的合作共生关系, 尤其是蔡英文在 2014 年再次当选民进党主席, 提出“开放办党”“引入社会力”的主张。虽然民进党、“台联党”、“极独”政治团体极力隐藏其对社会运动中的支配角色, 但社运和学运过程中的种种迹象依然暴露出“台独”组织躲在幕后指导、支持和支配社运方向的真相。其一是通过训练班的形式培训社运和学运骨干; 其二是直接给予物质和经费的支持; 其三是在游行、示威、静坐、占领的现场声援和护航; 其四是在舆论上予以支持, 公开阻挠台湾当局采取合法的维持秩序的举措。台湾社运组织则通过结盟联合成“公民监督国会联盟”、“公投护台湾联盟”等组织, 以支援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少数地位。

第二, 社会运动与选举政治相互交织。在台湾的社会运动中, 社运团体与民进党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互为表里、相互呼应的关系。“太阳花学运”、“反课纲运动”的出现, 一方面牵制了民进党的转

型,使其重新走向“逢中必反”的老路;另一方面也支持和配合了民进党在选举中争取胜利的节奏,“太阳花学运”成为支持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中获胜的重要因素,而“反课纲运动”对于2016年台湾大选也造成冲击。

有些人总以为在社运中打响名号是踏入政坛的捷径,然而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是绝然不同的场域,社运积极分子在政坛仍然必须经历严苛的考验。2014年12月所谓的“学运领袖”陈为廷试图投入苗栗县“立委”补选,但因性骚扰丑闻曝光被迫退选。2015年初,参与“太阳花学运”的社运团体“公民组合”分裂成两个政党,一是“时代力量”,吸收了学运黑手黄国昌的加盟,二是“社会民主党”,以社运活跃人士范云为召集人,他们均投入2016年初的“立委”选战。“时代力量”主张“终结一中架构、共创正常国家”,是“台独”色彩鲜明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则主张“政治是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在理念上相对务实一些。虽然台湾历次民意代表选举都不乏小党的参与,但在小党林立以及台湾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小党要在“立委”选举中取得席位并不容易。

第三,社会运动对于两岸关系的直接间接介入。2008年以来,台湾社会运动对于两岸关系的介入越来越直接,越来越热衷于提出牵制两岸关系的政治诉求,不仅公开打出“反服贸”、“反课纲”、“台湾独立”等“反中反统”的政治口号,而且直接阻碍《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生效,妨碍两岸两会领导人正常的交流交往。

由于台湾社会运动对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的介入,也间接冲击了两岸关系的发展。台湾社会运动与民进党等绿营政治势力结盟,协助民进党等绿营政治势力打选战,支持民进党上台当政。由于民进党拒绝承认“九二共识”,拒不放弃“台独党纲”,台湾社会运动在客观上也制约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巩固和深化。

第四,社会运动将呈现温和与暴力并存的抗议方式。台湾社会运动带有新社会运动的性质,“非暴力和公民社会是新社会运动的两大支柱”,^[16]但是近年来台湾社会运动的政治化倾向却使得极端暴力的行为屡见不鲜。台湾社会运动中,政党、学生、社运团体自认为代表“绝对正义”的一方,认定“我的观点、我的主张”就是全体台湾人民的观点和主张,因而当一些重大的经济、社会议题“不合我意”时,便是“国家暴力”、“无能政府”、存有“黑箱”、违反民主,高喊“公民不服从”,以此动员更多的人参与抗争。一方面试图以软性的无政府状态的自由秩序吸引逃避现实的青年的参与,呈现出温和感性、自我美化的面貌;另一方面却变相鼓励激进政治势力的发展,冲击官署、打击异己、对抗警察,把暴力当成正义。

因此,近年来的本质上是体制外的台湾社会运动呈现出温和与暴力并存的抗议方式。既有如“洪仲丘事件”中较为温和理性的白衫军,也存在“反服贸”、“反核”、“反课纲”中的破坏性行为。学生占领“立法院”、转攻“行政院”的行为无疑为之后的“反课纲”等抗议人群树立了某种示范。甚至在“反核”运动中出现绝食抗议,以生命相逼的极端手段让国民党当局遵从自己的意志,迫使国民党在相关议题上俯首就范,后续的抗议者恐将多有效仿。

第五,社会运动中网络科技将被更普遍地使用。2015年8月27日,财团法人台湾网络信息中心(TWNIC)公布2015年“台湾宽带网络使用调查”结果。调查显示,台湾民众上网率从2014年调查的75.6%上升到80.3%,推估台湾上网人数达1883万人;其中18至30岁民众的上网率达100.0%,成为台湾网络主要使用族群。新媒体为台湾社会运动提供了新的网络传播体系,进行不同的网络串连、动员、协作、讨论等行为,以便达成网络社运的三个主要目标:决策、动员支持者,以及社会对话。

“太阳花运动”中,年青一代对网络科技的纯熟运用,已经展现出它强大的威力。通过新媒体,达到迅速动员、筹集物资、自主掌握发言权乃至引导舆论、及时调配各地人员支援现场的效果。网络新媒体高度的开放性、隐蔽性,获取各种信息更为容易,能更激烈、更真实、更坦率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用躲躲闪闪、含糊其辞。随着网民聚集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信息技术的提升,台湾青年中网络社运组织不断涌现,发展迅速。这些新型社运组织主要通过网络或手机联系和组织活动,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台

湾青年的交往模式和群体参与模式。这些网络动员的社运组织将网上行为与线下行为相结合,不断向线下发展,常常“以虚带实”“由虚变实”,具有很强的社会动员力和行动力,成为台湾社会运动发展的新趋势。

四、结 语

近年来,台湾社会运动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反马反中反统”的表现,还是在运动形式上对于政党政治、选举政治、两岸关系的介入,均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化倾向。当然,社会运动转型成政治运动容易,但是社运人士要转型成政治人物并不容易。必须引起关注的是,社会运动对于两岸关系的介入已经实质上影响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尤其是“台独”政治势力利用台湾民众面临的社会问题和现实困难,以社会议题为突破口,把社会运动导向“反中反统”的政治性质,向青少年展开新一波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渗透。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注释:

- [1] J. Wilso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Move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5.
- [2] [13] 何明修、林秀幸主编《社会运动的年代: 晚近二十年来的台湾行动主义》,台北: 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2011年,第3页。
- [3] 萧新煌为《社会运动的年代: 晚近二十年来的台湾行动主义》一书所作的序“社会运动和社会运动研究的辩证”,见何明修、林秀幸主编《社会运动的年代: 晚近二十年来的台湾行动主义》,第VII、VIII页。
- [4] 参见萧新煌、顾忠华主编《台湾社会运动再出发》,台北: 巨流图书, 2010年。
- [5] 《林飞帆凯道演讲全文》,晏山农等著《这不是太阳花学运: 318 运动全记录》,台北: 允晨文化, 2015年,第367页。
- [6] 陈婉琪《太阳花学运静坐参与者的基本人口图像》,《那时 我在——公民声音 318-410》,新北: 无限出版、远足文化发行, 2014年,第234页。
- [7] [14] 信强、金九沅《新媒体在“太阳花学运”中的动员与支持作用》,《台湾研究集刊》, 2014年第6期。
- [8] [9] [10] [11] 《那时 我在——公民声音 318-410》,新北: 无限出版、远足文化发行, 2014年,第6页,第10页,第90页,第14页。
- [12] 《李淑珍信件全文》,晏山农等著《这不是太阳花学运: 318 运动全记录》,第392页。
- [15] 萧新煌、顾忠华主编《台湾社会运动再出发》,台北: 巨流图书, 2010年,第258页。
- [16] 黄汝接编写《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国外理论动态》, 2006年第11期。

(责任编辑: 陈小冲)

On the Political Tendency of Social Movement in Taiwan since 2008

Zhang Wensheng

Abstract: The social movement in Taiwan has been constantly rising since 2008, from the “Wild Strawberries Movement” to the “Anti-curriculum Change Movement”, which has shown its obvious political tendency. The movements have made a deep ideological brand, intervening in the political struggle in the island, influencing the Taiwan election and conta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which seem to have presented som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pro-Taiwan independence”, the young participants and the networking. Therefore, future social movement and political election, the writer believes, will become the two fiel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movement in Taiwan with the political trend in “Taiwan Independence”, political group, election and networking being more obvious.

Key Words: Taiwan, social movement, political